



怎样正确认识和 处理人民内部矛盾

周 原 冰 等 著

上 海 人 民 出 版 社



怎样正确認識和处理人民内部矛盾

周 原 冰 等 著

上 海 人 民 出 版 社

1957年·上海

怎样正确認識和处理人民内部矛盾

周 原 冰 等 著

*

上 海 人 民 出 版 社 出 版

(上 海 新 兴 路 54 号)

上海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 001 号

上海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

开本 787×1092 公厘 1/32 印张 2 1/8 字数 42,000

1957年11月第1版

1957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60,000

統一書号：2074·76

定 价：(6) 0.19 元

封面設計：范一辛

編 者 說 明

自党中央提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問題以后，讀者提出了一些問題，我們从中選擇了几个，分別約請了几位同志，写了 6 篇文章，編成此書。

本書的讀者对象主要是一般干部，其他讀者也可参考。

1957年 8 月

目 录

兩类社会矛盾的区别与轉化	周原冰(1)
人民内部矛盾在我国当前	
上升为主要矛盾的根本原因	凌雨軒(15)
談人民内部矛盾的長期性	
和今天強調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重要性	雪 之(26)
正視和揭露人民内部矛盾的积极意义	馬俊芝(38)
談談“团結——批評——团結”的方針	胡少鳴(45)
关于人民内部矛盾和反右派斗争	陈 原(54)

兩类社会矛盾的区别与轉化

周 原 冰

我想談談下面三个問題：(一)什么是敌我矛盾,什么是人民内部矛盾；(二)敌我矛盾同人民内部矛盾的性質与区别；(三)敌我矛盾同人民内部矛盾的轉化。

提出这三个問題来談,是因为許多同志在学习毛主席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問題”的講演时,对这些問題还不太清楚,我的理解也未必妥当,只希望供同志們在学习时参考。

一 什么是敌我矛盾,什么是人民内部矛盾?

敌我矛盾同人民内部矛盾,是兩类社会矛盾。

称为敌我矛盾或者称为人民内部矛盾,都是从人民的立場来提出問題的。反对人民的一方称为“敌”,人民的一方称为“我”。人民的敌人同人民之間的矛盾,就是敌我矛盾。敌我矛盾双方中的我之一方,就是人民,所以,人民内部矛盾也就是敌我双方矛盾中“我”之一方的内部矛盾。

从来沒有抽象的敌我,只有具体的敌我;因而从来也沒有抽象的人民,只有具体的人民。人民的立場,就是按照历史发展的方向,推动社会前进的立場。所謂敌、我,必須站在一定的具体的人民立場上来划分,才会有意义。

抗日戰爭時期，日本帝國主義、漢奸、親日派是為敵之一方；一切抗日的階級、階層和社會集團是為我之一方。我之一方的內部各階級、階層和社會集團間的矛盾，統屬於人民內部的矛盾。這是從抗日的立場，亦即以站在抗日人民的一方還是站在日本帝國主義的一方，來劃分敵我的。在解放戰爭時期，美帝國主義和它的走狗即官僚資產階級、地主階級以及代表這些階級的國民黨反動派，都是敵之一方；一切反對這些敵人的階級、階層和社會集團，是為我之一方。而我之一方內的各階級、階層間的矛盾，統屬於人民內部矛盾。這是站在民主革命的立場，亦即站在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資本主義的立場，來劃分敵我的。在現階段，在建設社會主義的時期，一切反抗社會主義革命和敵視、破壞社會主義建設的社會勢力和社會集團，皆屬敵之一方；一切贊成、擁護和參加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的階級、階層和社會集團，均系我之一方。這又是站在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的立場，來劃分敵我的。而一切贊成、擁護和參加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的階級、階層和社會集團間的矛盾，都屬於人民內部矛盾的範圍之內。不能夠一方面承認矛盾着的雙方都是人民，另一方面卻又否認它們之間的矛盾屬於人民內部矛盾的範圍，不能離開一定的具體立場來隨意劃分敵我，也不能離開一定的具體立場來隨意確定什麼矛盾屬於人民內部矛盾。

工人階級同資產階級間的矛盾，應當具體分析。

從勞動者反對壓迫、反對剝削的立場來說，資產階級是不事生產的剝削階級，工人階級是從事生產的被剝削階級，兩者間的矛盾，本應該是敵我之間的矛盾。但是，我國的民族資產

階級同工人階級間的矛盾，却出現了特殊的情況，從而表現為特殊的性質。

解放前的中國原本是個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國家，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不僅是全國勞動人民的敵人，而且直接、間接損害着民族資產階級的利益，於是，反對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便成為全國人民（包括工人階級同資產階級在內）在這一歷史時期的共同的最高利益，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資本主義，代表着這一時期中國歷史的前進方向。站在这个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資本主義的立場上，我國工人階級同民族資產階級才同屬於“我”之一方，兩者之間的矛盾也才算作人民內部的矛盾（1927年4月以後，民族資產階級曾一度追隨大買辦階級叛變革命，在這一段時期內，工人階級同民族資產階級間的鬥爭，自然不屬於人民內部的鬥爭，而屬於敵我間的鬥爭）。但是，工人階級反對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是要為建設社會主義掃除障礙，把中國變成社會主義的中國；民族資產階級反對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是要為發展資本主義掃清道路，把中國變成資本主義的中國。這兩條道路自始至終又是敵對的。

從全國大陸解放之日起，社會主義革命便成為現階段中國歷史的前進方向。凡是擁護這個方向和朝這個方向前進的，都屬於“我”之一方；凡阻礙或破壞向這個方向前進的，都屬於“敵”之一方。民族資產階級是社會主義革命的對象，他們同工人階級間的矛盾，本應轉化為敵我矛盾，但是，解放以後，我們國家出現了新的情況，這就是中國的工人階級掌握了國家政權並且和農民結成了鞏固的聯盟。這個工人階級領導下的

国家，又掌握了国民经济的命脉，把帝国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经济，转为社会主义的经济。这一客观的形势，以及其他国内外的有利于社会主义不利于在中国建立资本主义的形势，决定了我国的大势只能是趋向社会主义，而不能是趋向资本主义。我国民族资产阶级由于这种大势所趋，再加上他们本身的软弱性，在失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依靠后，在工人阶级及其政党的正确政策下，瞻望前途，权衡得失，因而又产生了愿意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一面。正因为我国民族资产阶级，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现阶段，有愿意接受社会主义改造和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一面，所以，他们才继续算在人民之内，工人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才属于人民内部的矛盾，工人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间的阶级斗争，才一般地属于人民内部的阶级斗争。

离开具体的时间、地点、条件，离开当时、当地的具体的立场，离开每一历史时期的革命任务，抽象地笼统地来认识我国工人阶级同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性质，是一种非历史唯物主义的观念，从这种观点来认识问题，便会得出错误的结论。

二 敌我矛盾同人民内部矛盾的性质与区别

敌我矛盾同人民内部矛盾，在性质上和形式上均有着根本的区别。划清敌我矛盾与人民内部矛盾的界限，有助于我们在革命实践中辨明方向而不致误入迷途。

首先，敌我矛盾是一种外部的矛盾。矛盾双方的根本立场是完全对立的，矛盾的双方没有利害一致的共同基础。人民内部矛盾是敌我矛盾中“我”之一方本身的内部矛盾。矛盾

的双方，尽管相互間有多大的差异或对立，但首先，在反对敌人这一根本点是利害一致的，其次，在共同追求的長远的或某一历史时期的总目标方面，也是利害一致的。因而作为人民内部矛盾的双方或数方，必定相互間有某种根本利益一致的共同基础。

只就我国情况为例。抗日战争时期，日本帝国主义、汉奸、亲日派，形成“敌”之一方；一切抗日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形成“我”之一方。这双方之間的矛盾是敌我矛盾。日本帝国主义、汉奸、亲日派的一切作为，都是为了侵略、损害以至毁灭我們中华民族；而一切抗日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則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汉奸和亲日派，保卫我們中华民族。这矛盾双方的根本立場、根本利益，都是完全对立的，沒有利害一致的共同基础。矛盾双方互以对方为攻击的对象，从而达到自己一方的目的。如只就抗日的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而言，它們之間也有矛盾，但在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保卫中华民族使其不致灭亡这一根本点上，形成了这一时期的利害一致的共同基础，因而他們之間的矛盾，不管严重到什么程度，只要这一共同基础尚未破坏，都还屬於抗日民族統一战綫内部的矛盾。解放战争时期，美帝国主义和它的走狗——官僚资产阶级、地主阶级以及代表这些阶级的国民党反动派，作为“敌”之一方；一切反对这些敌人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作为“我”之一方。这敌我双方也沒有利害一致的共同基础，而互以損害和消灭对方的根本利益，作为自己一方的根本利益。如只就反对美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动派的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而言，尽管它們之間也有矛盾，但由于大前提的

一致性，形成了共同基础，所以仍屬内部的矛盾——人民民主統一戰綫内部的矛盾。在現阶段，在建設社会主义的时期，一切反抗社会主义革命和敌視、破坏社会主义建設的社会势力和社会集团，都是人民的敌人；一切贊成、拥护和参加社会主义建設事业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都屬於人民的范围。一方要建設社会主义，另一方要反对以至破坏社会主义，因而从根本上講，是沒有利害一致的共同基础的。人民内部尽管也有矛盾，但在拥护和参加社会主义建設事业这一根本点上，形成了共同基础。章伯鈞、罗隆基、儲安平、章乃器以至彭文应、陈仁炳之流右派分子的叫囂和活动之所以具有敌我矛盾的性质，就是由于这些右派野心家們，在动摇着和破坏着作为今天中国人民这个概念的共同基础——建設社会主义的道路。

其次，正因为敌我矛盾是一种外部矛盾，矛盾双方的根本立場、根本利益是完全对立的，所以，敌我矛盾的斗争，一般來講，总是采取一种外部冲突的形式来进行的，这就成了敌我矛盾的一种屬性，这种屬性就是矛盾的对抗性。人民内部矛盾是一种内部矛盾，矛盾双方的根本立場、根本利益是一致的或者基本一致的，所以，人民内部矛盾双方的斗争，通常是不采取外部冲突的形式来进行的，而是采取比較緩和的方法，亦即在不損害双方共同基础和服从双方共同基础的前提下，进行批評或者斗争。而不管是批評或者斗争，其結果，总要求达到双方共同基础的加强、巩固和发展的目的。这也成了人民内部矛盾的一种屬性，这种屬性，就是矛盾的非对抗性。

所謂敌我矛盾是對抗性矛盾，人民内部矛盾一般是非對抗性矛盾，都是从其根本屬性來講的。至于具体問題，还应当

作具体分析。

人民内部矛盾的根本属性虽然是非对抗的，但由于“人民”这个概念中往往包容了好些不同的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这些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中，固然包括象工人、农民那样根本利益完全一致的阶级，也在一定历史时期内包括了象资产阶级同工人阶级那样互相对立的阶级，而人民内部的阶级对立，就不能不决定人民内部也有对抗性矛盾。同时，由剥削阶级的特性所带来的坏思想、坏习惯，在各部分人民群众中所遗留的影响也深浅不同，大部分人固然只是思想作风的改造问题，不致形成对抗，但也会有个别的以至一小部分受剥削阶级思想影响特深的人，在改造不力的情况下，也会产生对抗的一面。因而，一经深入分析人民内部矛盾中的某一具体矛盾时，便会发现有許多千差万别的具体情况，迫使我們不能簡單化。

例如，我国工人阶级同资产阶级的矛盾的性質，就是很复杂的。毛澤东同志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問題”的講演中說：“工人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一般地属于人民内部的阶级斗争，这是因为我国的民族资产阶级有兩面性。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它有革命性的一面，又有妥协性的一面。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它有剥削工人阶级取得利潤的一面，又有拥护宪法、願意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一面。”正因为我国民族资产阶级有兩面性，所以，毛澤东同志在同一講演中指出：“人民内部的矛盾，……在被剥削阶级和剥削阶级之間說来，除了对抗性的一面以外，还有非对抗性的一面。”我国资产阶级在民主革命时期的妥协性的一面，以及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剥削工人阶级取得利潤、在意識形态上和社会主

义不能相容的一面，便使得我国资产阶级同工人阶级之间的矛盾，具有对抗性质。我国资产阶级在民主革命时期的革命性的一面，在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拥护宪法、愿意接受社会主义改造的一面，又决定了我国资产阶级同工人阶级在如何进行民主革命及如何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等方面所产生的矛盾，具有非对抗的性质。

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在否认资产阶级的两面性的同时，也否认资产阶级同工人阶级间的矛盾，在非对抗性的一面以外，还有对抗性的一面。他们总想把资产阶级同工人阶级间的矛盾，说成只是非对抗性的，从而来模糊工人阶级的意识。如果我们竟也认为人民内部矛盾只存在非对抗性矛盾，全部否认人民内部在特定条件下，也可能存在对抗性矛盾，而又承认资产阶级属于人民的内部，那就很难和这些右派分子的言论划清界限；如果我们一面承认资产阶级是人民的一部分，一面又说资产阶级同工人阶级的矛盾不是人民内部矛盾，而是敌我矛盾，那便在逻辑上陷入自相矛盾的境地。所以，正确看待资产阶级同工人阶级间的矛盾，应当根据具体情况作具体分析，而不能把人民内部矛盾一般是非对抗性的这一共性僵化起来，否认一切具体环境、具体条件下的特殊情况。

三 敌我矛盾同人民内部矛盾的转化

敌我矛盾是一种外部矛盾，人民内部矛盾即敌我矛盾中“我”之一方的内部矛盾，这两类矛盾的相互转化，实即敌、我双方之互相转化。这里面包含着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由“我”之一方转化为“敌”之一方，亦即由“我”之内部矛盾转化为

“敌”与“我”之間的外部矛盾；另一种情况是由“敌”之一方轉化为“我”之一方，亦即由“敌”与“我”間的外部矛盾轉化为“我”之内部矛盾。在革命斗争的过程中，叛徒即系由“我”之一方轉化为“敌”之一方；敌方起义人員即系由“敌”之一方轉化为“我”之一方。

但是，兩类矛盾的“可能”轉化，并不等于“一定”轉化。是否終于轉化，决定于必要的条件是否形成和成熟。敌我矛盾的基本特点是：矛盾双方的根本利益、根本立場絕對不能相容，并且还互以消灭对方的根本利益，实现自己一方的根本利益为目的。由这一基本特点出发，又形成另一特点，即矛盾双方沒有利害一致的共同基础。因此，敌我矛盾双方的互相轉化，便有兩個先决的条件。第一个条件是矛盾双方中之一方，必須放弃自己原来的根本利益和根本立場，服从原来与自己为敌的一方的根本利益和根本立場。第二个条件是矛盾双方找到了新的根本利害一致的共同基础。

以我們党和国民党的关系为例，是最可以說明問題的。

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国民党实行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工农的三大政策，这三大政策同我們党当时所代表的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于是，我們党同国民党在这个共同基础上建立了統一战綫，同处于民主革命联盟中，同屬于“我”之一方，而以帝国主义和北洋軍閥为“敌”之一方。

1927年以后，国民党轉到了与此相反的方面，成了地主和大资产阶级的反动集团，从联俄、联共、扶助工农轉到反苏、反共、屠杀工农。于是，国民党便背弃了作为革命政党的根本利益和根本立場，而以帝国主义和北洋軍閥的根本利益

和根本立場，为自己的根本利益和根本立場。这样一来，国民党和我們党所代表的中国人民之間，就失去了利害一致的共同基础，从而国民党就由“我”之一方轉化为“敌”之一方。国民党和我們党所代表的中国人民之間的矛盾，便由民主革命联盟内部的矛盾，轉化为敌我之間的外部矛盾了。

此后，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发展到有灭亡全中国的危險，不仅工人、农民有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强烈要求，而且地主及大資產階級中头脑比較清醒的一部分人，也感到了民族灭亡將給予他們的根本利益以威胁。在民族矛盾大过階級矛盾的条件下，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后，国民党又被迫开始向停止內战、联合共产党共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这个方面轉化。所以，第二次国共合作，国民党从国共兩党敌我矛盾的“敌”之一方，轉化为中国人民抗日民族統一战綫与日本帝国主义、汉奸、亲日派之間敌我矛盾的“我”之一方，是由于它接受了中国人民的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这个共同基础。尽管他們抗日是并不积极的，它們也并未实际上真正放弃反共、反人民的阴谋，但在抗日救亡高于一切这个共同基础上，它們反共、反人民的活動，不得不比較隱蔽和处于非法地位。所以，当时国民党同我們党所代表的中国人民之間的矛盾，仍然屬於抗日民族統一战綫内部的矛盾，不过这种矛盾却是經常处于对抗状态，这种矛盾的性質，主要是对抗的性質。

1945年8月，日本帝国主义投降了，国民党同我們党所代表的中国人民之間，因民族危机而暂时建立起来的共同基础消失了，国民党中的当权派由其階級本性决定，又不願意接受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和根本立場，而要坚持反共、反人民的

反动立場，于是，国民党便又彻底轉到与全国人民为敌的一方了。

由于敌我矛盾的基本特点是矛盾双方根本利益根本立場的不可調和，矛盾的轉化，不是我降于敌，便是敌降于我，否則便不可能有什么轉化，因此，站在“我”之立場而欲促成敌我矛盾的轉化，只有加强和“敌”之斗争，这斗争的胜利可能以三种形式表现出来：一是彻底、干淨、全部地消灭敌人；二是將敌人繳械、迫使敌人投降，从而使他們丧失作为敌人的身份与能力；三是爭取敌人中的某些部分的起义或因势利导促使敌人放弃作为敌人的身分和条件。前一种形式不存在矛盾的轉化問題，而是矛盾的消灭或解决；后两种形式都包含着矛盾的轉化，即由敌我矛盾轉化为人民内部矛盾。但是，第二种形式却由于敌人只是被迫地失去作为敌人的身份和能力，而不是敌人已經从根本上放弃他們的根本立場，因而从形式上來說，他們失去了作为敌人的身分轉到人民方面来了，但矛盾的性質还不能不是对抗的。只有当他們被迫繳械投降后，經過改造，真正放弃了敌对的根本立場，那才进一步由对抗性矛盾轉化为非对抗性矛盾。只有第三种形式不仅是已由敌我矛盾轉化为人民内部矛盾，而且也由对抗性矛盾轉化为非对抗性矛盾。

人民内部矛盾，一般說来，是在一定历史条件下人民最高利益一致的基础上的矛盾。这个最高利益的一致，便是人民内部矛盾着的双方的共同基础。这个基础的破裂，便导致矛盾由内部轉化为外部。所以，由人民内部矛盾轉化为敌我之間的外部矛盾，便以矛盾双方的共同基础的丧失、破裂为标志。这可能有以下几种情况：

第一种情况是：原本互相敌对的阶级，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由于有着共同的敌人或者其他种种原因，在许多重要问题上利害一致，因而在那个时期他们曾经同属于人民内部，他们之间的矛盾曾经表现为人民内部的矛盾。但是，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双方共同的敌人已经被打倒或消灭，双方利害一致的共同基础已经消失，于是，双方固有的敌对性的矛盾便突出起来，那与历史前进方向相抵触的一方，如坚持其原阶级立场，坚决阻挠历史的前进，就由原来的人民内部的成员，转到人民敌人的位置，他们与人民之间的矛盾，就由人民内部的矛盾转化为敌我之间的对抗性矛盾了。资产阶级右派同人民之间的矛盾，就是这样转化的。

第二种情况是：在革命的阶级、阶层或社会集团的内部，也会有一些不坚定的分子，他们经受不了阶级斗争的长期的历史考验，往往在与阶级敌人进行斗争的时候，又同时接受了阶级敌人的思想观点以至生活作风的腐蚀。这些不坚定的分子，如果不提高警惕，不及时改正自己的错误，当革命形势日益深化的时候，便可能从革命的阶级、阶层或社会集团的内部分化出去，转到反革命的方面。同样的道理，人民内部自然也会有某些不坚定的分子、阶层或社会集团，因而在革命形势进一步深化的时候，便免不了会引起人民内部的那些不坚定的部分的分化，大部分由不坚定转向坚定，也会有一小部分转到人民敌人的方面，从而他们与人民之间的矛盾，也便转化为敌我之间的对抗性矛盾了。这种情况，在目前暴露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中，特别是在党内右派分子中，是不乏例证的。

第三种情况是：由于对人民内部矛盾处理不当，在一定的